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明华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明华 编写

目 录

一、积极呼应新政协	1
二、坦诚相见情切切	9
三、民主协商谋国是	24
四、翻开历史新一页	37

一、积极呼应新政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就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沉重的压迫，谋求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道路上，把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当做通过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早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建立民族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助，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被蒋介石叛变革命所破坏。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的主张，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结成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依然被国民党反动派不断闹磨擦，掀起反共高潮所破坏。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它在尚未做好全面内战准备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压力下，为了进行和平欺骗，在毫无诚意与准备的情况下，与中国共

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根据中共方面的提案签订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的规定，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5个方面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力争，使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议案，但时隔半年，蒋介石就用发动全面内战的魔爪，撕毁了政协决议，暴露了真面目。全国人民在事实面前终于认清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才能彻底推翻长期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因此，全国人民广泛地动员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政治经济日益走向破产。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相继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亿万翻身农民形成了反封建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同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在国民党反动派有增无已的迫害下，其领导人经中共帮助，纷纷出走，大部蛰居香港，在愈趋明朗化的局势下，先后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推翻蒋家王朝。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空前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

年10月10日发布宣言，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政策，并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3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朱德等会合，于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3条战略方针，研究决定了为夺取全国胜利在军事、生产、组织等方面的部署和措施。并研究了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局势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会议认为：召开新政协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已趋成熟，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从形式上看，与1946年旧政协的口号相同，但从性质到任务都是不同的。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第5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专电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领导人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帮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拟由中共与民革、民盟联名发起会议，并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当年秋季。拟邀请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马叙伦、章乃器、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20余人。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一经公布，在民主党派中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聚会，大家精神振奋，一致认为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民主人士应奋起响应。大家推举著名教育家、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起草电文，响应五一号召，同时决定：1、分别致电在美国的冯玉祥、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及海外华侨，呼吁响应。2、各党派以自己的立场发通电响应。同日，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黄炎培，亦就五一号召交换意见，在其后致沈钧儒等的函

作中，认为这是当前国家自救的唯一途径。5月5日，李济、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蔡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下简称“民联”），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表示召开新政协“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同时通电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希望能“共同策进，完成大业”。随后，这些民主党派又以本党派名义相继发表宣言或声明，重申了这一立场。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下简称“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号召，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同中共及各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从5月8日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对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特点、参加范围、召集人、会议地点及会议议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具体

设想。沈钧儒说：中共除了以武装斗争达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外，同时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达成民主革命的道路，这说明中共不是要实行一党专政，决无包办国是的意思。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谭平山认为：在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这个主张必须切切实实能够实现，又必须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李济深、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革机关刊物《自由》、民盟机关报《光明报》，致公党机关刊物《公论》等报刊，先后公开发表文章，参加了关于新政协诸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不但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而且在各界、各阶层乃至海外爱国华侨中，都普遍引起了强烈反响。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声明指出：五一口号证明：中共的领导人物，能够高瞻远瞩，把握住每个阶级的愿望，而并不象反对者恶意中伤的那样，企图再来个一党专政，它决不会象国民党反动集团那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实行改朝换代的封建把戏。在港的妇女界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孔德祉、郑坤廉等23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热烈称赞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体妇女的要求，并代表妇女界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

开新政协的口号！”6月23日，翦伯赞、胡绳、邓初民、千家驹、侯外庐等19人，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留港理事”资格发表声明，认为五一口号是非常适时地指出了一条真理之路，一条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唯一的胜利之路，号召全国学术界、文教界同仁积极行动起来，为迅速实现人民政权而奋斗。在上海，黄炎培、胡厥文、胡子婴等20余人，为响应五一口号，成立了“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以聚餐的名义，开始讨论解放后的城市秩序、劳资关系等问题。在北平，吴晗、张奚若、雷洁琼等大学教授，于6月间两次召开座谈会，一致认为新政协的提出是一个英明的政策，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伟大气魄，是诚心诚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在海外，爱国华侨获悉五一口号后，纷纷表示拥护。5月3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社论，称“时期已至，海外侨胞应于此集结一切力量，准备拥护未来人民政府”。5月4日，马来亚、新加坡侨团代表500余人举行大会，会后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并希望新政协早日召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利益。随后，马来亚的吉灵丹州、霹雳州、檳城、威斯莱等地的侨团纷纷集会，分别通电响应五一口号。暹罗（泰国）华侨、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加拿大华侨、古巴华侨等也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纷纷表示响应。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表之际，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宪国大”在一片聒噪声中草草收场，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行宪国大”上闹剧频起，有人竟带着棺材去赴

会，连国民党中宣部也不得不承认：“少数代表在竞选副总统过程中，道德败坏，纪纲废毁，良为痛心”。各民主党派、各阶层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在热烈拥护五一口号的同时，对“行宪国大”表示了严正的否定态度。5月2日，民盟中央发表紧急声明，指出这次“行宪国大”的代表，以党棍、特务、贪官、土劣之流占压倒优势，用粉饰的民选、伪装的民主，盗用民意，实施所谓宪法，选举伪总统，对这种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之举，本盟予以坚决的否认，5月3日、4日，民革、民联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其行径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如出一辙，并郑重声明：凡伪国大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的对内一切立法，对外签订的条约，一概不予承认。农工民主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海外华侨组织也接连集会并发表声明，一概反对“行宪国大”，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的反帝反蒋反封建政权的斗争，为促成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联合政府早日实现而奋斗。一时间，广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与一致反对蒋氏“行宪国大”成了鲜明的对照，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南京政府和美帝方面对此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和忧虑，国民党中宣部于5月中旬对其所属发指示称：“切不可忽略其在政治上之意义”，并称民盟等民主党派致电毛泽东，“充分表现其不甘长期寂寞，大有强迫共匪出面领导彼等登场之势”。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急急飭令其在香港的机构，要求以调查民主党派等进行的新政协活动为中心工作。美国驻南京政府大使司徒

雷登也为此专派20余名美侨及记者，加强对港、沪方面民主人士活动的调查。

中共中央对国内及海外各方面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十分重视。8月1日，毛泽东专电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表示“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10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陈嘉庚及各地侨团说：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同五一口号，热心卓见，无任感佩，望与各界侨胞随时电示对新政协的各项具体意见。为了适应统战工作和筹备新政协的需要，中共中央在8月召开的汇报会上，专门讨论了筹备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安排问题，并于9月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统战工作和新政协的具体筹备工作。中共中央还发出指示，要求沪、港、平、津等地党的组织认真做好应邀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的护送和接待工作。

二、坦诚相见情切切

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

侨的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与中共共筹新政协的召开和建国大计。

在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从香港来的为最多，其中除原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外，还有一些是从上海等地转道香港而来的。登陆地点先是罗津（朝鲜境内）、安东、大连，然后转往哈尔滨，辽沈战役后转至沈阳集中。平津解放后从青岛或天津登陆，转往北平。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做好北上的护送与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做了详细周密的布置，专派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身份前往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章汉夫等人，以进行经济贸易工作为掩护，租赁船只，安排民主人士北上。由于香港环境复杂，民主人士社交又比较广泛，做好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几乎每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中共中央特别是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尤其是当船只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时，就连续追询下落，直到得到平安的消息才放心。在港的钱之光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每次都事先对上船路线，遇到情况如何应付等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缜密研究，切实落到实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自香港分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朱蕴山、章乃器、黄炎培等，还有各民主党派重要成员及著名无党派人士，其中包括：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柳亚子、许广平、张曼筠等，先后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共300多人，举凡响应了中共五一号召和积极

投身于民主事业、反对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人士都怀着欣喜之情奔向解放区。每次民主人士北上都事先化装成商人等不同身份，于黄昏时分分头出发，并分别由中共驻香港组织负责人章汉夫、连贯、李嘉仁等陪同护送。

民主人士中有些人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或有很深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拉拢某些有影响的人物，以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白崇禧就曾派黄绍竑执其亲笔信专程赶往香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由桂系取代蒋介石，与中共划江而治。为了促成李济深北上，中共党组织对其家属做了妥善安置，革命老人何香凝亦劝李济深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形势的需要早日成行。在李济深摆脱阻力决定北上后，中共党组织巧妙安排了上船路线。12月26日，李济深、朱蕴山等人乘游艇游弋于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游艇靠在苏联货舱“阿尔旦”号舷边，李济深等迷惑了监视者，登上了北上的“阿尔旦”号，顺利启程了。

从光怪陆离的香港奔赴阳光明媚的解放区，使许多民主人士感慨万端，纷纷赋诗抒怀。郭沫若赠其妻于立群的留别诗中表示：“慷慨付人民，谢君许我走。”“献身 为三反，此心只一条。”朱蕴山在《夜出海口》中写道：“环海早无干净土，百年阶级慨同仇。神州解放今日始，风雨难忘共一舟。”彭泽民以诗言志：“廿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异域尽教多蔓草，不能依系旧王孙。”柳亚子充满欢欣地吟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见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船行途中，民主人士还办了《破浪壁报》，

开联欢会，大家一同交流讨论新政协的有关问题，并一起唱歌、跳舞，为电波传来的胜利喜讯而欢庆。

1949年2月，当陈叔通、柳亚子、马寅初及新从美国讲学后返港的剧作家曹禺一行20余人北上时，途中受到了国民党海军的盘查，船长辩称是开往朝鲜仁川的货船，而且各民主人士均已化装，国民党下级官兵又不甚熟悉他们，这才将船放行。但狡猾的国民党军对于这只北上的船只还是将信将疑，放行后仍尾追监视，进入渤海湾后，又遇到一条国民党的船，一前一后，前后监视，直到接近仁川才解围。这样几经周折才脱离危险，掉转船头，向解放区进发。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民主人士的密切协作下，分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都安全到达解放区。

乘船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分别在大连、天津、青岛等地登陆，每批民主人士到达，都受到当地中共党组织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前往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分别在大连、安东及朝鲜罗津登陆时，东北局领导李富春、张闻天等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专程赶往码头迎接，同时转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欢迎之意，旋即一同乘车到达目的地，安排在当时最好的宾馆下榻，举行丰盛的宴会为他们接风洗尘，并送上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御寒物品。这些周到的接待使民主人士都十分感动，有人得到衣物后拿出钱来要付款，负责接待的人员连忙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这都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听了连连称谢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连衣食住行都亲自安排，真是太感谢了！其实他们那里想到，

就是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这时还没有一件不挂补丁的外衣！而尽了最大力量安排好民主人士的生活，使他们能一心一意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有的民主人士由衷地表示：原以为中共来自农村，没见过世面，而事实上中共吃苦在自己家里，对我们是毫不吝啬的。

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及时发来了慰问电，除表慰问外，还请他们对新政协的各项具体问题提出意见，以使会议臻于完善。李济深、沈钧儒等亦纷纷复电，表示愿将自己所知所有尽情地贡献出来，与中共一道为使新政协圆满成功，早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民主人士从进入解放区起，就立即着手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

接待民主人士的另一个地点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为了做好接待工作，统战部专门在秘书处设置了一个招待科，并集中力量赶建房屋、制做家具，配备勤务员、厨师，最大限度地安排好民主人士的生活。先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民进创始人之一、鲁迅胞弟周建人；民盟马来亚支部主任胡愈之，民盟中执委、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文学翻译家楚图南；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雷洁琼；著名剧作家、《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词作者田汉等。他们先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李家庄，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盛情欢迎，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在百忙中多次抽出时间与他们会见，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亲切交谈，讨论关于新政协的各种问题，认真听

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夜里，周恩来打电话召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到西柏坡，告诉他们：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签定，你们要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政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也一起去。齐燕铭等遵示连夜启程，与周建人等一同乘车向北平进发。到达北平时，恰值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周建人等应邀登上前门城楼，与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以及林彪等一同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人城部队。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后，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心就转到了北平。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便从天津、青岛转往北平。为了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南下，中共中央专派政治局委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以来各阶段革命斗争的革命家林伯渠，自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民主人士。行前，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与民主人士“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中共中央还电示东北局，要求“林老与民主人士入关时，望东北局令铁路总局派专车并派有纪律的部队一个连随车护送。”林伯渠到沈阳后，说明了来意，同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意见，使民主人士深受感动。2月23日，在沈阳的民主人士35人由林伯渠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启程，途中郭沫若吟得五绝一首，诗云：“多少人民血，换来此殊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25日，专车抵北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100余人到车站迎接。

1949年2月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军管会、市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从沈阳、李家庄来的和原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林彪、彭真分别致欢迎词,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九三学社领导人许德珩等分别上台讲演,他们一致推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盛赞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表示坚决在中共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当天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就在西苑机场与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代表见面,庆贺相会在北平。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数日间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江南数省,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原在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相偕北上,有些年介耄耋的老者,也不顾旅途跋涉之苦,应邀来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的盛会。83岁的张元济就是其中的一个。张元济是前清翰林,曾官至刑部主事,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积极倡导变法维新,光绪皇帝为谋划新政,在中南海勤政殿召见康有为,第二天就召见了。新政实行不几天,发生政变,康有为亡命日本,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身陷“天牢”。他在到达北平后就到勤政殿参观,这时的勤政殿已成为新政协筹备会的会址。张元济重游故地,抚今追昔,无限感慨地说:与这个勤政殿一别52年了,想不到还能在